

陆忠伟
著



把脉世界

(下)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把脉世界

(下)

陆忠伟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美、中日首脑互访及 中美日三边关系*

1997 年秋至翌年春，是中、美、日这三个太平洋邻居的外交季节。9 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对中国的国事访问、11 月中国李鹏总理及翌年江泽民主席对日本的回访，在太平洋西岸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写下了笔墨浓重的一笔。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以及已提上议事日程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于 1998 年对中国的回访，将是为太平洋东西两岸构筑新型合作关系的重要举措，可以说是迈向新世纪的里程碑。

对中、美、日三国来讲，目前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历史时刻。1997 年 9 月，桥本龙太郎在党内竞选中不战而胜，蝉联自民党总裁，并自然当选第 84 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同时，其领导的自民党在众院取得过半数的 251 席。这是该党自 1993 年 7 月大选失利之后，首次在众院获得对决策具决定性影响的多数

* 本文发表于《现代国际关系》1997 年第 12 期。

席位。

在美国于1996年11月5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克林顿以压倒优势的379张选举人票击败共和党候选人多尔，出任跨世纪的美国总统。尽管美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严重，但美国两党各派力量格局、政治潮流及经济增长势头，已构成克氏当政的有利因素。

另外，中、美、日三国都在推行雄心勃勃的跨世纪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战略。美国的跨世纪构想是建立以信息、金融、服务三大领域为基点的“新经济”支柱，并以其在国际政治、经济、贸易、金融体制内的竞争规则优势，为其国家目标服务。

日本正处于一个继1868年明治维新和1945年战后改革后的另一次历史大变革时期。继承了历届内阁政治遗产的桥本政权，正全力以赴推行行政、财政、金融等六大改革；要对战后日本经济、政治赖以发展和稳定的“1940年体制”和“1955年体制”动手术；并出台了旨在提高日本国际战略地位的“欧亚大陆外交”政策，拟在世纪交替之际为日本的国家发展注入活力。

中国的跨世纪发展战略的主题词是富强、民主、文明，邓小平理论成为中国的百年治国方略。对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在历史发展中的正确定位及基于中国国情（亦即社会主义之“段情”）而提出的改革设想与理论突破，为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注入了巨大的动力。

不言而喻，这三个太平洋国家的首脑在国内继续推行、落实跨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关乎战略成败的周边与外部环境，特别是三边或其中的各对双边关系予以特别重视。因为，中美、中日关系刚开始从危险的急剧下滑中成功地恢复过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这两对双边关系的特征。从中国方面来看，“远交近和”是其世纪之交的主要外交思维，“美国 +

周边”则是“交”与“和”的重要对象，由此足可掂量出中美、中日关系在其外交中的地位与分量。

问题的复杂在于另一方面，即美国、日本对华政策的定位与定性。冷战结束后，所谓“长城战略贬值论”和“中国威胁论”一度甚嚣尘上。美日对华战略的定调因之带有浓厚的冷战色彩。围绕对“遏制战略”的讨论、对“接触战略”的试行及对“融入战略”的定向，反映出这个三角关系的不等边态势或扭曲；再加上涉及对华关系的一些问题，在美、日国内各党派之间一直被拿来作为政治斗争、派别斗争的题目，政策论争往往与党派、派系之间的政治纠葛缠绕在一起，使事态更为复杂。

从80年代末至1996年，美、日在对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及国家走向的定位与定性上基本是一致的，但因各自所处战略环境、地缘位置、历史渊源等国际关系要素的不同，其对华关系的矛盾焦点也因时空变化而不尽相同。美中关系的矛盾集中于两个“T”（台湾、贸易）、两个“H”（人权与香港）。日中关系的矛盾焦点集中于两个“T”（台湾、日美安保条约）及两个“H”（历史与人权）。总之，冷战后美、日对华战略的调整与消极定性，以及受国内政争及舆论误导影响的外交操作不当，使90年代以来的这两对双边关系不时出现痉挛性发作。在1996年中美、中日双边经贸关系分别创下历史最高记录的同时，其双边政治关系则相继跌入建交以来的最坏状态。

综上所述，在以中、美、日为主角的超级棋盘上的战略态势并不十分理想。一着不慎，满盘皆乱。不仅双边关系动荡，三角关系失衡，甚至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地区稳定与经济发展。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最近在美演讲时强调，如果美中关系不好，对两国都将是灾难。对中国会影响它的经济发展，影响它与邻国的关系；对美国将迫使亚洲国家在中美之间作出困难的抉择。所

以，从这一角度讲，美日两国审时度势，将对华政策调整到合理位置颇为重要。而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就是对对华关系的定性与定位。此外，就是要避免在建立战略框架之前的历史过渡阶段，出现足以影响全局的情况。

二

从整体上说，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现已有一些有利于稳定的因素在出现。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 1997 年 9 月 4—7 日的中国之行，从双边角度看，为构筑跨世纪的中日关系起到了促进作用。若把桥本访华放在一个更大的外交背景下来观察，即可发现桥本访华与日美关系调整、中美关系发展有因果联系。可以说桥本访华实质上也是中、美、日三角关系的重新调整和磨合。颇有影响的英国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亦独具眼光地指出，桥本此行是为了给由日、中、美构成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东亚三角带来平衡。

桥本龙太郎的访华是自去年以来日美高层互访、中日首脑马尼拉会晤及江泽民主席访美、李鹏总理访日等美、日、中三国外交活动大组合的主要一环，或者说是大国外交的连锁反应。其方向是积极的，旨在促进三边关系的扩大均衡或总体提升。在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桥本发表了演讲，他强调中日应“建立真正的相互谅解及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桥本还对日本侵华历史再次表示道歉，并保证日本将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桥本的承诺博得了中国听众的好感，中国领导人在中共十五大前夕的百忙之中，给了他颇高的礼遇。

在跨向 21 世纪之际，日本对华关系发展有两个趋势，亦可称之为战略矛盾。一个是它要对建交后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中日关

系进行历史性调整，提高日中关系战略地位。用日本自己的话说，即要使之形成“亚太中的日中关系”和“世界中的日中关系”。

另一个发展趋势即把中国作为《日美安保条约》的对象。在这一态势之下，当日本被迫要在对美与对中关系上作战略抉择时，必然要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来服务于日本的对美同盟关系，因为日本认为日美关系在日本外交中所居地位是“基轴”，对日本国家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与历史意义。故而桥本首相在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问题上“寻求中方理解”的同时，仍明确表示，对“日美同盟的基本框架不做更改”。尽管日本政界及外交部门表示，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但是在涉及战略抉择时，日本是很难巧妙操作，使得这两对双边关系并重。被认为护宪色彩浓厚的日本媒体《朝日新闻》在就桥本访华发表的一篇社论中说，《日美安保条约》与《日中联合声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本身就有矛盾的性质，通过一次首脑会谈，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是很难的。

联系到亚太安全全局，日本在对美及对华战略之间也有所权衡。作为对日美关系进行历史性调整的补充，日本将相对加大推进日中关系的力度。换言之，为了巧妙地在对美与对中关系上保持平衡，日本对华政策的积极面将相应突出。今年以来，日本在有关人权、香港回归、柬埔寨政争及东南亚金融风暴等外交问题上，均突出了“自主”色彩。桥本访华前后，中日关系在经贸领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首先，中日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举行的双边谈判取得了进展；双方在削减日本产品的进口关税等问题上达成重要协议。其次，中日渔业谈判达成协议；再次，日本对华提供了近17亿美元（2029.1亿日元）贷款，平均利率为2.3%。在中国接受这笔贷款后，日本对华提供的贷款总额已达

20.5 万亿日元，跃居最大对华援助国地位。桥本的访华可以说在“过去”（历史认识、中止经援、钓鱼岛问题）的问题上“修复”了日中关系，致使中日关系暂趋平静；但在推动双边关系的“未来”方面，却仍留下了有待完成的“家庭作业”。

日本外相小渊惠三上台伊始便表示，将以日美关系为支柱，继续奉行前政府的政策，保持同亚洲国家的友好关系；他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是“以适当方式”完成对日美军事合作“新指针”的审查。1997 年 9 月，日美正式批准“防卫合作新指针”。不管日美军事分工原则落实到什么程度，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对美、对中这两大外交关系互为影响的背景下，日本官方在关于日美防卫合作矛头所指“范围”上的口径将越来越模糊，解释将越来越抽象。这种“模糊战术”虽可将双方的战略歧见一时遮掩，但若在“指针”修订问题上不彻底根除冷战思维，今后的双边关系就仍有发生摩擦的危险。

日本的分析家中有些人认为，只要中国内地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台湾海峡就不会“有事”，故而台海纳入美日防卫合作“范围”的事态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这种判断实际上忽略了事物的因果关系。台海风波乍起，并非成因于一时的气候变幻。“台独”势力在岛内的发展步骤，很早就已开始准备。对于这类颠倒事物因果关系的看法，无需做太多评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的修订，是给台湾发送了一个错误信号。

在亚洲的国际关系史上，一个强大的中国与一个强大的日本并驾齐驱的现象史无前例，而这种现象又是在亚太安全格局出现变化的背景下产生的。中日两国的战略利益具有客观上的相对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要求这两个邻国必须建立稳定的外交关系。中日高层首脑的互访，将成为两国开辟未来 25 年关系的新起点。不

言而喻，这条道路漫长而又不平坦，可喜的是，桥本首相访华期间，双方已就高层定期互访、加强在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对话及加强两国议员间交往达成了一致意见，可以说这是为建立两国富有成效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迈出的第一步，其意义怎么评价也不为过。李鹏总理于11月11-16日对日本访问的圆满成功，对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将产生深远影响。李鹏总理提出的五项原则，有利于中日确立友好互利合作，以及推动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三

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在经过一时的风雨飘摇之后也在趋于稳定。美国在如何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正在形成明确和比较趋向于一致的看法。尽管美国国内在中美关系上仍有不顾大局的做法，但这对关系已经越过了“对抗引发对抗”的一处险滩，从而为进一步建立与发展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

苏联解体后，华盛顿对北京的外交政策经过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定位、定性、定调与定向的调整与摸索，或者说遍及朝野的大讨论，正在形成一个可以规范较长一段时期的政策套路。国外一些评论家将这一方式的内容概括为“暂时的或有条件的接触，或暂时的或有条件的围堵”；接触是手段，亦是态度，而非具体政策；遏制是装置，是任何一项政策的固定部分；融入是目的，是一个过程的终结或另一个过程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以规范未来走向的政策过程，预测以其效果为中心内容的战略思维，它在对华关系的发展上每前进一步，总是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对美关系的动态变化和发展趋势。

长期趋势当然包含许多变动的因素，但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取

向基本上也有了一个轮廓。即认为一个稳定、开放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中两国的合作有益于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要求双方加强对话，提高合作的层次和范围，在这个框架之下，寻求解决诸如军控、两岸关系、加入世贸组织等结构性问题。总之，这两个太平洋国家在国家利益方面，有不尽一致的一面，也有不少消极因素在影响这对双边关系的稳定；但另一方面，一些共同的利益要求这两个国家积极进行合作。可以说，中美关系将是一个包括合作、竞争、对话等国际关系所有要素的、复杂的多方面关系。这正是这对双边关系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现阶段的“段情”。它需要的是积极推动相互关系向前发展的政治愿望和彼此信任，以此来改变 90 年代以来双方关系“摩擦—谈判—恢复”的滞缓状态。

从中国方面来看，寻求一个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国际与周边环境，是在当前国际格局下的主要目标。对美关系是其外交政策的主线，亦即影响中国外交全局的主导因素；它规范或影响着中国对其他一些国家外交关系的发展。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 16 字方针及“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倡导，亦是针对现阶段中美关系“段情”的决策思维。在推进双方关系的过程中，要随时考虑到事情在时间和空间上将要经历的发展变化。从这一角度讲，北京对华盛顿的政策取向与美对华政策有一个较粗的底边，在此基础上发展关系，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且有较大潜力。

江泽民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及已提上议事日程的克林顿总统的回访，是改变中美关系 7 年徘徊局面的重要外交举措。两国关系固然有数不清的麻烦、棘手的难题与矛盾，但是前进的方向既然明确了，事情就好办得多。中美关系停停走走的情况需要这

种推动力。而且，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远非两国双边关系、双边利益所能概括，它对亚太安全格局具有巨大意义。故而可以说，中美高层的互访、对话，本身就具战略意义，是中美铺设战略合作轨道的良好开端。

依目前情况和条件看，中美关系发展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但客观现实的行程又将是曲折变化的。这就决定了双边关系稳定的相对性。换言之，双边关系的稳定不是自在而成，而要自为而得。这就涉及战略合作的内容与框架。就框架来说，双边关系的相对稳定，需要有一个机制或制度，它足以能在双方高层、外交决策及实际运作部门之间沟通信息。

在战略框架方面，两国需要进一步加固双边关系中的稳定装置。80年代末以来，中美关系之所以能斗而不破，是因为有两个因素在起稳定作用：第一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第二是各种地缘因素，即华盛顿在处理对亚洲关系时所需考虑的对华政策选择。这两大因素使中美关系在呈现周期性波动的同时，能基本上刹住下滑。在中美关系面临重要转折的今天，在这对重要双边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再增加一个能有效处理利益冲突的稳定机制，亦即中美首脑的定期会晤；两国军队、经贸、外交部门的直接对话；两国议员或两国媒体的经常性交流。在中美关系的定向与定性过程中，这一机制尤为重要。因为，经济和商业纽带在真空中是不能持续发展的。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及社会全面进步，将不断提高其同外部市场或外部世界的联系水平，这种联系纽带的加强，本身就构成对亚太和平与发展有利的稳定因素。这里有一个重要、深刻的历史法则在起作用，就是中国在认识、接触世界，中国在积极地朝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方向发展，这个大方向今后仍不会变。

否则就难以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在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NPT)、《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化学武器公约及生物武器公约》等多边安全与经济机构上取得进展。最近,中国又加入了恪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桑戈委员会”,与部分西方发达工业国就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协议。这些事实表明,中国的安全与外交政策取向旨在维护国际局势的稳定。对此,美国在对华战略上,对中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双边关系或国际环境的愿望,应作出积极回应。

在诸如加入世贸组织等方面,确实牵涉到各自的经济利害关系,问题不大容易摆平。但是两国在战略上的共同利益相对更大,因而应能进一步坚持与加强对话与合作关系,切勿让整个中美关系成为某一特定问题的“人质”。在双边合作内容方面,两国一些切身利益确实需要协调,但更需要一种公正、客观、务实及相互尊重的理性思维,“心诚则灵”,而非“指点江山”。

中国经济的崛起有益于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中美关系的稳定对双方有益,中美关系的发展对地区与世界局势稳定有益。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说,中美首脑会晤对双边关系意义重大,它将成为建立有效合作和减少分歧的新契机。中美关系的成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江泽民主席访美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江主席站在战略高度,同美国领导人共商双边关系未来发展的框架和目标,这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江主席美国之行取得了重大成果,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建立了中美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确认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推动了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

四

中日、中美首脑的互访,以及这三对重要双边关系的定位与

定性，在客观上造成了中、美、日关系在较大程度上的互动。美日不再是输赢关系，中日已有和平条约所定性的关系，美中也在努力建设战略关系结构；但在三边结构内，却会或已经出现了两对一的、假想的威慑对象。1996年4月17日日美发表的《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及1997年9月两国确定的新《防卫合作指针》，为日美两国的跨世纪战略合作定了调，其矛头所指，世人皆知。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无对象的军事同盟。

正如中国的一句谚语所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据报道，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提议，就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举行“三国政治安保对话”，其动机无非是要打消美日所签新《防卫合作指针》所引起的中国的疑虑。两个战略军事盟友，与作为威慑与接触的对象搞三边安全对话，至少从目前来看，似乎条件还未成熟。

可以说，目前三个太平洋邻国都愿意建立正和博弈的合作关系，但要具体预测这一关系的发展及最终的外交态势尚嫌过早。据日本媒体报道，中国外长钱其琛在会见日本记者访华团时表示，对民间层次的意见交换很感兴趣，可见三国之间第二轨道的学术性会谈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实现。另外，亚太地区诸如“东盟地区论坛”（ARF）在多边安全合作上也已有较大进展：关于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已取得不小共识，关于预防性外交亦已起步。我们希望该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能有助于促进地区稳定，安全领域的新思维能有助于促进国家间的信任。

应该为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发展制定一项可持续战略，这一发展战略可区分为近、中、长期三个阶段。当然，这些阶段不应被视为截然分开的断层，而应被看作是一个连续过程的转合与承接。从短期看，应保持这一三角关系中各对双边关系的高层定期会晤及战略对话态势，并将其持续认真地进行下去，以便三国之间增信释疑。

从中期目标来说，如上战略对话的开展，应有助于中、美、日三国在战略上的互相兼容，淡化“威慑”色彩，并在共同利益之上建立旨在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

作为长期目标，应以发展共存、共富、共强的国家关系为目标，在此前提下建立比较广泛的战略合作框架，使之足以保证双边关系稳定、三边关系顺畅，并有助于地区稳定。在此基础上，为中、美、日三角关系制定一项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希望所有大国都能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形势下，建立一种不互相敌对、不互相对抗的新型关系，并将其提升到大国关系新模式的高度，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

“新指针”意欲何为* ||

战后较长时期，日本推行“一个中心，两个基点”的国家战略，即以实现“经济大国”为国家目标，以日美同盟、和平宪法为两大国策。进入90年代后，经济至上逐渐被“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所替代，两个基本点之一的日美关系调整提上了外交决策议程。为配合新国家战略的实施，日本迈出了十分危险的几大步：1996年4月，日美发表安保联合宣言，从战略高度对同盟重新定位、定向；1997年9月，两国军方推出防卫合作“新指针”，从军事层面界定了矛头所指的“范围”与“对象”；刚出台的相关法案则把军方的意图上升为国家意志，使之能突破宪法的制约，突出了日美军事同盟，为实现“政治大国”、进而为实现“军事大国”战略服务。这一系列举措，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 新防卫指针及相关法案的出台，表明日本对美、对华关系的调整基本上同步到位，在日美中三角关系中，日本企图以牺牲中国的安全利益为日美关系服务。

日美关系的调整，给日本提出了几种战略选择：“脱美入

* 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1999年4月30日。

亚”、“联美入亚”或“脱亚入美”。日本决策层综合多方面因素，最终作出了“联美入亚”的谋划，即不惜在外交、经贸上付出高昂代价而坚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基点”不动摇，核心是敲定了日本在“周边”地区配合美军行动，回应美国出于亚太战略考虑而要日本在军事上进一步配合的要求，借机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角色。问题的要害在于，世界上不存在无假想敌的军事同盟，中日两国是和平友好条约缔约国，如果作为和平友好条约缔约一方的中国成为日美军事矛头之的，显然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对中日关系的亵渎，是一种零和博弈（Zero-sumgame，在国际关系中，意指一方得利另一方受损）的外交权谋。

（2）新指针及相关法案拒不明确将台湾排除在外，对我国的统一大业构成威胁，埋下了美日与我战略对抗的隐患。

日美将军事合作范围定位在“周边”，并称这不是地理概念，是事态属性，但从不明言不包括台湾。从日本一些政要的言论及相关法案设定的事态类型看，其欲染指台湾的意图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首先，1951年缔结的《日美安保条约》有一个“远东”条款，1960年日本官方将其定义为“菲律宾以北与日本周边，也包括韩国和台湾”。在此问题上，日本一直吞吞吐吐，含糊其辞，但内心都是肯定“远东”的地理概念。其次，相关法案设定的多种“周边事态”基本是地理属性，诸如周边地区“发生了”或“将发生”武装争端；某个国家“发生内战”或“内乱扩大”等等，显然这种“周边事态”不是指欧洲、南美洲或非洲，实际上是圈定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地理范围。换言之，若中国为威慑“台独”、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采取行动，当美国非法介入时，日本都将依“法”通过与美军事合作间接或直接介入，必将使中日关系出现大倒退。

（3）新指针及相关法案使日美军事同盟向“北约型”演变，

日本突出军事，参与“集体防御”，将军旗打向海外，从而使其“专守防卫”、“不作军事大国”的防卫思想名存实亡。

“新指针”是相对于1978年的“旧指针”而言的日美军事合作原则。其“新”意主要有三：第一，主功能从“专守”日本变为对地区冲突的武装介入；第二，军事空间从“远东”扩展到“周边”；第三，对美合作从提供军事基地的静态参与转为实战的动态合作，为此增加了40多项军事合作项目。“相关法案”是保证新指针落实的配套法律，它共由三条法规组成：一是《周边事态法》；二是《自卫队法修正案》；三是《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这是一整套为日本调兵遣舰、运送弹药、参与联合作战开绿灯的“战争法案”，具有进攻性和危险性，使日本完全改变了“专守本土”的防卫性质。

《周边事态法》等相关法案一旦实施，日本将如何运作呢？按日方的设计，基本上有如下程序：某年某月日本周边“发生了”或“将发生”武装争端，美国绕过安理会动武，并要求日本参战；日本政府如认定属于“周边事态”，随即制订对美合作计划。同时，由首相任主席的“安全保障会议”研究对策，上报内阁会议决定。此后，自卫队开始担当运输武器、粮食、弹药的“后方地区援助”及救助遇险美军的“后方地区搜索救助活动”。自卫队从“后方”支援参战美军，是军事力量的外向攻击反应。因为现代战争很难区分前线与后方；况且，战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打粮草，打辎重，后勤是重要环节。总之，新指针是日本鹰派借船出海、突破宪法制约、扮演地区警察、提升区域战略地位的谋划，这对亚太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4) 新指针相关法案的出笼，将引发日本国内的修宪思潮，日本进一步增强军备、脱离和平轨道的危险性增大。

9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抬头，军国主义思潮泛滥，